

文化研究的立场

何春蕤、宁应斌(台湾“中央大学”)

一 演 讲

何春蕤：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在文化研究上的进路，我们想要说明这个学术和论述的进路是在台湾社会历史的变化中、透过了运动实践论述的“争战”所模塑出来的；个中反映了台湾地区在全球联动中的特定位置和相应的自我认知，它和台湾现实的连接，以及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所衍生出来的机会和局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我们要讲的也就是这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分成四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由宁应斌老师来讲我们的文化研究进路得以形成的历史时刻，主要就是学院实践在历史现实中所形成的文化场域；第二部分由我来讲学院实践与运动的渐次结合；第三部分要讲如何穿越学院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疆域；第四部分要讲，学院知识生产与运动紧密结合以后，如何引发了国家和法律的关切。

宁应斌：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机遇”，这个名词的出现，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大家知道，不管是在马克思的学说里，还是在社会学的功能论学说里面，都很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后来人们对此逐渐有所反省，就出现了一个说法，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也就是“未意料到的结果”，就是说，你有你的意图(intention)，但是会产生你意图之外、未意料到的结果。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关键字(buzz word)，就是 contingency(偶然性)——跟必然性相对的——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起来。于是就有人强调在结构下面的主体能

动作用(agency)。这些说法,其实都修改了原来讲的“结构决定-必然性”,转而强调了“机遇-偶然性”。这样的一种知识典范转变背后,有许多历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因素,这里没法详细讲。但是我想要指出:“机遇”这个词是具有历史面向的,因为“机遇”总是在历史中、在各种因缘际会中形成的,对不对?

讲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文化研究当然有它的大形势,但是也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在促成它的发展。我们今天谈文化研究,马上就会想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典范:对通俗文化的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福柯学说等等各式各样的理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化研究的形貌,是已经定型了的、现成的形貌。你们作为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可能很自然就会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的研究要符合文化研究的正宗典范”,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真正是文化研究的东西,才可以去文化研究的期刊或会议上发表。所以你们想知道“什么是文化研究?”也就是说,可能对你们来讲,文化研究已经是一个客观外在的东西,是一个“现成”的学科,对你们的研究实践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我们今天主要想讲的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打破这些限制。尤其在第三世界,在中国的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我们更要有意识地去打破这些学术框框。如果你回顾西方的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它其实也是从偶然走到了必然。比如说,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往那个方向走的——当霍加特开始做研究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文化研究”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那样一种学科,他其实是想去研究“劳工文化”;而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的劳动文化还没有受到当时流行文化的“污染”,劳工有着他们自己的文化形态——他们下了班不是钻回自己小小的公寓里看电视,他们可能在社区里一起唱歌、做其他事情。霍加特对那种文化特别向往。可是当“二战”结束以后,新的流行文化开始兴起,美国的通俗文化开始进入英国,那些新的年轻的工人都跑去听(受到美国影响的英国乐团)“披头士”、看流行电影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去研究工人,就不能再像霍加特那样做了,于是就会有对

“次文化”的研究,演变至今,甚至看起来好像文化研究就是以研究流行文化为主的。在这里你会看到,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其契机一开始其实是对劳工的研究,而劳工研究的背后则有着更大的社会实践的目的,也就是左派要改造社会的想法,但是经过一连串的演变(包括葛兰西的影响),文化研究才成为了今天的这种样子。

同样,台湾的文化研究在最初也不是我们今天已经形成的学院化的状态。其发轫期差不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个时段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台湾刚刚“解严”,各种社会运动开始兴起,而80年代也正是西方理论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太多人关注文化研究——除了陈光兴,他刚好是美国那些做文化研究的人的学生,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些西方学者也还是处于混沌的阶段,还在界定什么是文化研究应该走的路线、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家谱”,所以诸如 *What is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之类的书开始出现。

当时在台湾开始发展出一个叫作“文化批评”的实践,这种“文化批评”好像隐隐约约地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学术化的研究,而文化批评则未必有那么学术化,它当时主要是在报纸的副刊上发展。副刊以前被人称作“报屁股”,台湾“解严”之前副刊登的基本上都是些短短的、小小的、通俗性的东西。“解严”之后,首先是在一个反对派的报纸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空间,给了当时刚刚回台湾的留学生一些发表看法的机会。刚开始,大家中文也还不太好,写的文章经常夹杂着一些从英文里翻译过来的术语,大家都看不懂(众笑)——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比较新奇的现象,文章的内容则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话题。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写手,大家都在副刊上写东西。

这些文章之所以能够被接受,主要是因为“解严”之后,民众有一种心理,想要知道外面的东西、新的东西。另外就是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对社会现状不满,他们想要知道更多

的社会思潮。还有，“解严”以前报纸受到了很严格的控制，不能太厚，也不能成立新的报社，可是“解严”以后，报纸一下子就厚了起来，从两三张变成十几、二十多张，同时新报社也大量成立，这样一来，报纸对稿件的需求量就大增，所以写的文章看不懂也没关系（众笑）。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说的这些因素就构成了刚才讲的“因缘际会”。

原则上，报纸副刊要是单讲社会性、时事性、流行现象的东西而没有文学之类的东西，副刊的品位似乎就有些下降；同时，副刊似乎也不应该登学术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看不懂嘛。而当时我们在副刊所写的那些文化批评文章却恰恰就是社会时事或流行却夹杂着一些学术性，也就是原来副刊不喜欢要的两种东西（因为社会时事或流行太俗，学术太艰深）。不过妙的是，现在我们把“社会时事或流行”与“学术”结合在一起，既非单纯时事或流行，亦非单纯学术，反而还很受欢迎。

比如你的文章谈流行歌曲，这个本来应该是在“影剧版”，可是你谈这类通俗的东西，却用了一些女性主义啊、结构主义啊之类的学术性观念，这对台湾的报纸副刊来说也是很新奇的——这刚好是两种文类的结合——副刊原本不要太艰深的学术文类，也不要太通俗没品位的文类，现在你把这两种文类结合起来，它反而觉得可以接受了。原本副刊的文学气息与品位，有点曲高和寡，但是现在却可以大谈通俗流行的东西，吸引读者的眼球，不过又有点学术品位的包装，内容也可能真的有些洞见与社会批判，让读者对当时变动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有个解读与批评的窗口。于是乎，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文类出现了，而且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文化批评写手，不同于以往副刊的文学作家。

这些新的文化批评写手都喜欢用些新奇或奇奇怪怪的笔名（像战争机器、省港旗兵、东方败之类），甚至连报纸也不用简单的“作家”来称呼他们，而冠之以“文化工作者”的名字，像现在你们觉得这个词没什么，但在当时的台湾，大家可觉得很新鲜；当时若是有人要做单干户，也都取像什么“XX个人工作室”。这些名字现在可能都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当时都很新鲜。这表示文化领域有一种标新立异的气息。

同时,当时的台湾社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文化批评”可以生存。一个是当时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开始慢慢模糊;还有,就是台湾的文化开始走向民粹,所谓“贴近人民”,认为文化应该是通俗的、普通人都能接近的(像台湾的云门舞集这种艺术性质的舞蹈团体就会去户外跳给普罗大众看);再有,媒体跟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媒体开始有“造势”的活动,而不只是简单地报道新闻。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吧:现在有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是属于高等文化的,你根据它来拍出一部电影,你把它表现得具有高度的政治争议性,而你采用的又是某种艺术电影的形式。可是你透过大众媒体和文化工业进行强力的促销,最后把它变成了一部卖座电影,轰动了新闻世界——这种情况在台湾发生过,就是《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对它进行批评的话,你很难说它是影评还是媒体批评,或者社会政治批评,或者还是其他什么,因此,台湾的现实也促成了这种很复杂的、难以归类的文章的出现。

那么这些难以归类的文化批评文章,又如何和“文化研究”发生关系呢?因为这些文章里运用了当时一些文化研究的理论或概念,有些写手后来在学院里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有些写手自己也把这类文章归属于(非学院式的)文化研究杂文;透过这样的建构,于是我们说:OK!这就是文化研究进入了台湾地区。

后来,随着台湾地区逐渐趋于稳定,副刊的批判空间也开始变得萎缩起来,写作文化批评的空间也大幅地减少了。一些写作文化批评的学者就进入学院做文化研究。

讲了这么多,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文化研究在台湾地区刚开始登场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从学院里面出来的,它非常有活力!今天,这种活力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方面的制约,已经不太能够再介入报纸副刊,但是它的这个精神还存在着。

跳开一点讲,我作为一个哲学系的教师怎样来做文化研究呢?学科的区别或界限是什么?很多社会学者则有如何和文化研究区隔的焦

虑？也许这些学科界限的问题也困扰着作为学生的你们，或许你们也分不清楚，例如到底哈贝马斯是社会学家还是哲学家？福柯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如果你压根没想过学科界限这回事，那很好！证明你还没老化、僵化，只是在那里想地盘的问题。

这些年我始终告诉自己一件事情——能不能坚持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永远要去做我认为重要的研究，也就是能介入重要现实议题的研究：管它什么“文化研究”、什么“哲学”！这些都不管它！今天哪一件事情或议题是现实重要的，你就要借着研究去介入它。当然，什么是现实重要的议题，每个人因为所处的位置会有不同的评估，但我觉得只要社会有影响重大的紧迫事情，那就是重要的，你就要去介入、去发言，运用你所有可能运用的武器、你所有的研究机会与研究资源。研究机会可能是基金会提供经费的项目（台湾叫作研究计划），但也可能是社会运动或者活生生的研究主体当事人。有的研究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很多研究机会都需要自己去争取，例如参加社会运动。当然，有时候即使你想去研究某个问题，但你未必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做学生的时候，我那时绝不会想到我后来会去做跟“性工作”有关的研究——打死我也不相信（众笑）！甚至何春蕤在1994年开始谈“性解放”的时候，虽然提到了性工作，但是我们也都不知道我们后来会去研究“性工作”。但是有一天，台湾的“公娼”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公娼的抗争搅动了社会的时候，那就是现实重要的事情，就需要我们去研究与介入了。公娼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前一秒钟，如果你问我这辈子会不会写与“性工作”有关的文章，我都会告诉你应该是不会的——但是谁会想到妓女会上街呢？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事情对我知识的刺激其实是蛮大的；我自认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性工作与现代性》。

总之，社会运动或者说社会实践，就是一种研究机会。大家想一想，假如今天某个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物质或者新的行星，那他会不会特别珍惜这样的发现？同样，社会运动也是如此，不管你怎样想，它就是一个研究机会。像我刚才讲的，“性工作者”的出现是你意想不到

的,可是呢,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社会里的一些阶层关系,突然冒出来了,这个现象,如果你能够去研究,你就会发现许多社会的矛盾、许多你原来习焉不察的东西。

好,我结束在这里,下面请何春蕤接着来讲。

何春蕤:好,看起来,宁老师不但讲完了台湾一些学术与知识分子开始做文化研究的历史社会脉络,而且还开始讲了原来预定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学院和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例子是台北公娼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启发和激励。从表面听来,你们可能觉得第一,宁应斌老师好像在讲古——他讲的都是“古代”发生的事情;第二,他在“道德训示”——不停地告诉你们“应该怎样”。不过我建议你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老实说,我们今天说话的方式和我们谈的内容其实就正在“示范”文化研究:“示范”我们之中一些人是怎样做文化研究的,“示范”我们对于自己在做的研究、对于我们为什么会走到某个方向,要如何进行一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在“说”自己怎么做文化研究,我们这个说的方式和过程就是在对自己“做”文化研究。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讲文化研究有什么核心的概念,那就是这种对于自己在做的事情不断有所认知、反省、历史化、脉络化的思维和实践模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很重要。一般来讲,进入学院以后,大家倾向于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研究?好像一旦知道文化研究有哪些重要人物、哪些重要经典之后,就知道怎么搞文化研究了,一旦知道文化研究的理论,就可以出去实践了。可是我们两人今天想要“示范”的,就是:我们原来都不是也没想过自己是搞文化研究的;相反的,我们是在搞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的过程中,逐渐与文化研究经典化的过程形成了某种关系和关联,而在这个接合的历史时刻,我们才变成了“在搞文化研究”。因此,在这里其实已经“示范”出一种思维,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结构性”的绝对笼罩,也没有什么“主体性”的独断独行,这两者其实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历史机缘和社会脉络中因着互动而接

合发展。我们希望帮助大家认识的就是这种思维。

好,因为宁老师已经讲了我们搞文化研究的社会历史脉络,那我接下来讲在文化研究的脉络中学院和运动的关系,或者换个语词:“理论跟实践,到底应该有怎样的关联?”在台湾地区也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好,都有很多人针对文化研究的浮现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应该是属于自我反省的问题,不过也有人专门用这个问题来“反省别人”;什么样的人呢?

主要就是两种人:一,左派;二,右派(众笑)。左派要质问别人的理论与实践之关联,因为左派说:“你搞文化研究,根本不对!你应该下放到运动里面来搞‘工运’!”他之所以问你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因为他其实已经预设实践高过理论,而且只有他想的那些实践才是真的实践。右派看见你用文化研究来提供弹药搞社会运动,心中很不爽,他们追问理论和实践的关联,其实是要说:“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是应该保持某种距离吗?毕竟,学院和运动是根本不同的领域!”

左派、右派都爱问实践和理论的问题,我则从来不问(众笑)!因为对我来讲,理论和实践并不分离,也没先后,算是连体婴,因此理论跟实践要如何结合,根本不是问题!刚才宁老师提到的公娼运动以及更早些的同性恋解放运动都构成了学术理论发展的动力和紧迫性,但是学术理论的视野和论述也同时构成了这些开疆辟土的运动前进时的两翼包抄。如果理论和运动的接合在社会运动中十分活络,而且透过不断的磨合(而非主导)和对话,合纵连横,往往可以打下比较大的社会空间。

让我说白点,如果你不去认识或甚至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没有介入干预社会的常态过程,而只是每天抱着文化研究经典读,那你很难能够批判地或有创意地运用这些经典,因为你理解的都是抽离了现实的理论,是一些过去曾经活跃介入社会的行动的遗迹。要是你不在它的历史现实以及你的历史现实中去读,去思考,去检验,读得再多再深也是个蛋头学者而已。就如同你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讲“阶级”,但是如果你

没有从自己阶级以外的阶级生活去研究、去观察、去体会社会的阶级关系,那么“阶级”也就只是抽象的两个字而已。唯有当概念和某一些人、某一些事有机结合的时候,概念才可能彰显出它事实上的内容和它真正的含义,也就是这个概念和其他相关概念的关联,和现实事物的关联。就学院的知识分子而言,原来学院知识所具有的那种优势——例如读过理论,认识社会结构与机制等等——当你遇到了和你很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原来那些认识是很稀薄的、不足的,而这个遭遇、这个觉悟才是实践的真正意义!套一句流行的话,从异己来认识自己,从边缘来介入主流,从现实来发展理论,从运动来指引批判,这才是研究资源的源头活水。

大家现在崇拜经典,崇拜大师,可是所谓经典和建制都是在后来学院体制中沉淀形成的。而领域不同但是分享反思批判路数的人,多半都是寻求各种思想资源,结合文学解读、社会分析、文化批判以及其他学域中可用的论述和思想工具,因而构成了具体跨越学院内部疆界的研究进路。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如何穿越学院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疆域。

很清楚的,文化研究是个跨学科、跨学域的东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搞文化研究的,不过很多时候,人家都说我们搞的是性别研究、同志研究、后殖民研究或其他研究;也会有人来问,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同志研究、后殖民研究、XX研究,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具体的、阶层的,基本上就是看你在哪个场域里,看你想要把你做的事情“说成”是什么。到了文化研究的大会,我就是搞文化研究的;到了性别研究的大会,我就是搞性别研究的(众笑);如果到了亚洲研究的大会,那我就是搞亚洲的文化研究、亚洲的性别研究(众笑)……

不过讲到跨越学科的疆界,我们倒确实跨了很大的步伐。宁老师是研究哲学的,我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可是这十几年来,我们主要的研究兴趣都在性和性别方面,也在这些领域里做了很重要的学术工作,我

们为什么会越界对“性”议题产生兴趣呢？

在我们还没有回到台湾以前，其实也思考过一些台湾社会文化的问题，也写过有关性和性别的文章，可是并没有特别聚焦到“性”和“性别”上面。我们1988年回到台湾以后，最初是很广泛地写文章，试图把我们在学院里学到很空泛的这个主义那个思想运用到现实的状况里面，作为我们对台湾社会的一种介入。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常用的一个重要模式就是“比较法”，就是以我们在美国读书之前的台湾经验，跟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所看到的“解严”以后的台湾社会文化状况进行比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我们先前有些经验，我们现在有些观察，中间则有些理论作为分析的工具。我们怎么让这些东西融合进我们的论述脉络里面去呢？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且战且走”：介入了以后，你才会发觉你的知识不够用，于是你又再去寻找、再去看，要想办法去找到顺手的武器！

我个人对“性/别”的问题比较关注。因为在这个时段，台湾的女性力量与女性意识正在崛起，同时，社会文化现象里有很多话题是跟“性”有关的，比如当时都会区有很多新式装潢的钟点房（台湾叫宾馆或汽车旅馆）出现，显然很多人有需求，这样的实践一定有其特殊的意义需要挖掘。当时有些人将钟点房的普遍化视为“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众笑），批评得很厉害，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新兴现象并不那么简单，那么要怎样把这些边缘的性实践重新组编成一种进步的意义和力量，而不只是大家偷偷摸摸地偷情呢？到底要怎样描述这样的现象，才能指出它所具有的政治性质，而不只是私人事务？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论述挑战——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已经在那边冒泡的、已经很热地、被媒体批评得很厉害、而女性主义者又完全没有回应的新兴边缘的性现象，我们要怎样赋予这些性现象新的意义、新的诠释，以至于能够把这些原本可能只是私人性质的、没有确定目标的、偏差与自发抵抗主流的力量给统筹起来，向着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解放性的，也就是政治性的方向前进？

换句话说,一般性道德所谴责的许多边缘性实践,还有一些被当作偏差的新兴性现象,原来并不具有什么性政治意义,可能只是私人的事务,只是自发的偏差行为,但是这些性实践与性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在背后(例如中产阶级妇女的兴起、资本主义商品的欲望化),这些性边缘偏差是这些结构与力量的矛盾作用下所产生的,或者说,它们是和现成的性体制以及性别体制或社会其他体制有矛盾与冲突的,所以才变成偏差或边缘。这些偏差边缘的性可以是社运的切入点,社运可以扩大其与现有体制的矛盾,用运动和新的诠释论述来转化矛盾,转化这些边缘偏差主体,最终则是为了改变整个体制。我们一直被误解为性自由派,性解放被误解为性自由。其实性自由派只是说:无害他人的性实践应该被容忍,但是我们性解放派则是想转化这些性实践的意义,转化这些性实践的主体,进而影响社会其他的主体,改变性的主流意义与建构,并且让这个性转化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或解放运动挂钩,达到反抗所有压迫形式的目的。性的解放运动和阶级解放、性别解放等应该连在一起,因为所有被压迫者应该彼此联结,而不是互相倾轧。在性权力关系中、性别权力关系中、阶级权力关系中、族群权力关系中被压迫的人们要联合起来寻求解放,这才是解放的真意;这是激进社会运动的眼界,而不只是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而已。

1994年我写《豪爽女人》这本书,其实就是在做台湾的文化研究,我希望提供一个脉络性的解释,对“性”在当代的文化意义、布局、权力进行一个以“性别”为观察进路的分析,而在这样的分析架构中,“钟点房”这种新兴的性现象可以得到一个进步的、解放的意义。当然后来我这个介入方式结果又被“左”、“右”两边打了:“右”边说我带坏女人和小孩,败坏社会风气;“左”边说“情欲”这种事情没那么重要,应该先追求经济上的平等。

不管被谁批判,我们在学院内的研究工作总是有着学院内的正当性,而当这些正当性越过象牙塔的边界去与边缘弱势结合时,就会动摇到原有的阶级和区隔,因而也会引发希望维持原来社会赏罚制度的势

力反弹。例如 2003 年我们性/别研究室的动物恋网页链接就被保守的宗教少儿保护团体告发,说我们散播猥亵等等,这个官司的开展以及国际学界、社运界的反应,也使得研究者更深刻地看到各种力道的纠缠竞争,也因此拓展了我们对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排斥社会(exclusive society)、管制国家(new regulatory state)、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等等相关理论的认知。在这个例子里,学院和运动其实完全分不开。

讲到这里就进入了今天要讲的第四部分,也就是一种不局限在学院范围里的文化研究以及它的“危险性”。由于这样的文化研究会突破原本学院里的清高、客观、科学等等自我定位,对那个一心要维持阶序和权力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言,这种根本“入世”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搅扰,一种质疑,一种挑战。它很具体地撼动了既有的结构,生产了有“党派性”(partisan)的学问和知识,而且会把它占据学术优势的“力道”借给劣势阶层的人,提供正当性给原先被区隔为边缘低下的阶层,因而搅扰到原本社会的区隔和定位。

这就好像我们开始做同性恋研究、性工作研究、跨性别研究(这些都是性权力关系中被压迫的主体),而且在研究的进路上拒斥让原来的歧视成见主导我们的研究,生产出来的学术知识自然则和其他既有的学术知识形成竞争和紧张的关系,这种党派性显然会扰乱既有的秩序和利益分配原则,也使得原来没有正当性的边缘人口分享了一些正当性。

具有这种危险性,而且在学术实践中毫不畏惧地把这个危险性显现出来,结果当然不会没人理会。例如后果之一就是曾经我们一些人向政府单位申请性工作或青少年情欲相关研究计划补助的时候会被无理地排除为“不通过”,有时要经过我们提出严谨的辩驳申诉才又复活。像人兽交这类研究计划我们根本就懒得提,因为不可能通过。后果之二就是前面提到的:2003 年有 11 个宗教少儿保护团体联手告发我在学术网站上提供人兽交链接散播猥亵,一开始舆论对我很不利,但是后

来各方进步力量的声援斗争,使我最后以“无罪”终结。换句话说,当学术认识到自己和现实有联结而挺身挑战社会的隔离和阶序时,立刻就会有严厉的反扑,这也使得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研究的可能意义和能量。

文化研究常常说串联(articulation),也就是在言说实践中进行串联,其实今天从头到尾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 articulation。我们在说自己怎么样遭遇到这个社会的现实以及不断出现的弱势群体,我们怎么尝试把我们所学的、所经验的、所看到的串联起来,构成了我们搞文化研究的历史过程和内涵。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这个方向上走。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

二 讨 论

郑威鹏(香港岭南大学):

谢谢两位老师将他们过去二十年来文化研究的历程告诉我们。在看两位老师的文章的时候,我其实有三个方面的观察:一个方面,就是两位老师关注的,其实都是现代社会对人的“规训”的问题;还有就是两位老师所做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都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用的都是福柯的“系谱学”方法;第三个方面,就是两位老师的研究背后,其实都有很确定的伦理学的、政治的关怀。

我提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与个体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性”带来了自主的个体,但是同时,它又将个体纳入到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规训”体系之中,而这两方面其实永远是在矛盾之中的。而两位老师的研究所关注的,其实正是这样的情境之中的个体,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余亮(上海大学):

我今天的回应主要是针对何老师有关“跨性别”、“性工作”的研究的。今天两位老师讲的这个“因缘际会”我非常欣赏,就是既然有这个

机会,就一定要抓住它。但是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发现问题,这个方式可能还值得讨论。比如中国现在流行“超级女声”,铺天盖地地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呢?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不值得那样做。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旁听同学:

请问性工作者是真正自愿的吗?还有老师们怎么看约翰·费斯克,他把主体对流行文化的挪用也当作某种反抗?

宁应斌:

现代性高举个人自主,但是却又有更多规训;这个事实要在历史过程中,像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发展、现代性的偏重工具理性等这些过程中去理解。现代性既是解放也是牢笼,这在福柯之前就有很多思想家指出来了,所以我不认为这是福柯真正的贡献。我认为福柯的思想和他作为同性恋是分不开来的,虽然他也有很多其他的身份认同与关怀,例如他和左派的纠葛、与其他同侪思潮的斗争都造就了他思想的形貌。不过同性恋与性政治的思考角度,让他产生了很多洞见。

我认为福柯的重要洞见是他把身体、性的问题连接到“社会控制”问题、政治经济、治理等问题上。而福柯想要你看到的,其实“性”就是一个主要矛盾;当代政治经济的体制之所以能够被造成,靠的其实就是对身体的“规训”(包括性、生殖、常态、健康、长寿等)。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者”也好、“左派”也好,他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成人”的世界、“健康”的世界、“异性恋”的世界,可是我们需要回头去想一想,一个儿童是怎么样被养大的?他是在怎样的“身体政治”里面、在怎样的知识与权力技术里面变成了我们社会中个人主义的“主体”?

很显然的,有些男性知识分子只喜欢“大”问题,就是政治经济、中国前途等等伟大问题,像性/别则是不值得一顾的小问题,或者只是大战略下的一个比较局部的问题——而这正是福柯所要质疑与颠覆的,福柯认为那个国家治理的大问题其实和性与身体相关。这是福柯对一般异性恋男性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挑战。

男性知识分子的思考事物中有一个阶序,政治经济或国家前途或大师的理论思想等等在最上位,其他的则视其与上位的相关性来决定其重要性。与政治经济、国家前途、大师理论无关的,最不重要。其实男性知识分子的这种思考阶序表现出他们对日常事务的无能与疏于认识。总之,我们要放弃政治经济等在上、其他议题在下的阶序,不能说政治经济等是“纲”,其他的都是“目”。

其实我们应该有“阵地战”的观念,在“文化战场”上,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立刻“上纲”到政治经济问题的,所以“脱衣舞”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它很可能跟社会其他部分的变化有关系,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各种管制之间的关联性。或许有人说,脱衣舞不是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政治经济才是主要矛盾。但是这没有反省为什么一种矛盾会被建构为主要矛盾,这其实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建构结果,这反映在脱衣舞娘是被政治经济精英所支配的。如果今天的世界是脱衣舞娘支配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精英,那政治经济肯定不会是主要的社会矛盾。

有些社会矛盾也是个人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例如性/别是某些人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当然这也是权力关系的建构结果。像有的人虽然是下层阶级或少数民族群,但是他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却可能是他的性/别身份。这我在以前的文章写过,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刚才同学问的“超级女声”呢?这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无法上纲到政治经济或国家前途?可是,超级女声挑起那么大的能量,引起那么多群众的兴趣,当然是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如果你觉得没有动力去管超级女声的事情,那说明了超级女声和你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无关,或者跟你关怀与认同的社会矛盾无关,例如超级女声没有或很少影响到你的利益。这是很可能的。不过作为一个文化研究人,如果通俗文化里面所有类似的现象都引发不了你关注的动力,那么你就不适合做文化研究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性工作者”是否“真正自愿”的问题。“自愿”这个问题不应该被“形而上”化,而是具体地和“胁迫、强制”对立。我们每

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自愿或不自愿。你说你今天穿什么衣服是自愿的吧!那我也可以说这不是自愿的:你为什么不穿唐朝的衣服?因为我们这个后西方殖民的时代决定了你就得穿西式的长裤,对不对?所以“自愿”与否,有时候要在一个压迫和反抗的脉络里来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压迫存在,而你要采取反抗,这个时候才谈得上“自愿”不“自愿”,在这个脉络里谈“自愿”才比较有意义。刚刚有人提到约翰·费斯克做研究的进路,现在有很多人都批评他过分夸大主体的反抗诠释与流行文化的颠覆性,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费斯克学说有问题,费斯克就真的有问题了;你应该了解他研究问题的脉络,而不要觉得怎么在费斯克的理论里什么东西都是反抗?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看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替什么人在发言。

何春蕤:

让我继续补充宁老师关于“主体”的问题。大家经常会说,“主体”是通过了种种“规训”手段才被创造出来,而“主体”总是被纳入到更大的“体制”之内等等,分析到最后则是一个“上纲上线”的质疑:“主体的反抗难道真的就是‘反抗’了吗?你的反抗只不过是掉到另一个权力的陷阱之中”等等。我通常会这样来响应这种质疑主体行动的问题:“你这个质疑背后其实预期得到什么效应?是想让这样的‘主体’怎么做?是透过质疑来叫他别动?别反抗?别‘自主’?别‘自愿’?你到底要他怎样?要等你来指导才是真正的反抗?”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从概念来检视现实,相反的,你得问,引用“主体”来质疑他人的选择或实践,这样引用概念,最终是想形成怎样的效果?

我还想再讲讲“反抗”的问题。你们看我写“钢管辣妹”、写“性工作者”,你们觉得很容易——真不容易!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养大的,我和你们一样,也对“钢管辣妹”、对“性工作者”有过一些现在你们还看不穿的成见。如果你脑筋里都是传统的成见,要是想讲出钢管辣妹和性工作者有她们的“反抗性”,我告诉你,真不容易!因为我写论文的时候

都快累死了！（众笑）在这整个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你必须挣脱自己在整个教育和文化调教的过程中所承载的主体位置。要跳出这个框架去看另外一片天地，去找到那个“抗拒”的意义，真是不容易！我认为做这样的研究、写这样的论文，最难的，不是去跟研究对象讲话啊，或者去搜集相关资料；最难的是：她们因为自己的背景，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资讯，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自己的认知，而我这个研究者要在其中找到她们行动的脉络意义，因为她们行动是有偏差的，所以其实是对体制具有搅扰性的意义，要把这样的意义串联出来，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所以你不要小看约翰·费斯克可以处处看到“反抗”，在他当年的脉络中，大家都在骂“次文化”没思想、没知识、胡乱涂鸦，但是费斯克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能更深刻全面地分析社会，能智慧地运用理论资源，创造出不一样的但是具备穿透力的眼界。刚才有同学问，“超女”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讲？嘿，你得先问你自己，你能讲点什么吗？你有没有什么有搅扰意义的话要讲？如果没有的话，讲也没用！所以不要去问我是不是该做超级女声或者什么流行话题，而是先问：我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如果你有话讲，觉得你的话会有独到的意义和效应，那你就讲。

“性工作”的“自愿”说，这个问题我们常常遇到。你们也知道，这种问题的问法通常是与其他的一些说法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没有人会问你们：你们是不是“自愿”来上这个研讨班的？（众笑）而且，“愿意”是一种复杂的状态，我们活着有百般的无奈，可是我们还是“自愿”啊。

通常，我不会去怀疑“主体”说他“自愿”，他要说他“自愿”，他就是“自愿”的。但是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就是去消除那些会让他没法说他是“自愿”的那些条件，比方说道德正当性上的压力。

汤惟杰(同济大学)：

谢谢两位老师。从何老师关于“麦当劳化”的文章当中，我感觉到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非常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之大，使得它可以迅速

将以前在它领域之外的东西纳入到它的逻辑之中。我是把在您的文章里面读到的资本的文化逻辑放到了对宁老师的文章的阅读过程之中的。比如针对“伟哥”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伟哥”本来是辉瑞公司在生产心脏病药时的副产品,原来辉瑞公司生产心脏病药品的逻辑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健康”之上的,可是,一旦有了“伟哥”,“情欲”、“性”等东西便被迅速地纳入了新的商品生产的逻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批判性话语该怎样产生作用?

宁应斌:

我简单地回应一下。在何老师写“麦当劳化”文章的前后出了一本书,就叫《麦当劳化》,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后者的意思比较接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经济秩序,那么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全世界建立起殖民秩序,而这刚好是何老师反对的。何老师恰恰是认为,即使是像经济这样的东西,它在殖民各地的时候,它也要结合本地的文化条件才可能落地生根,(何春蕤:因此才可能产生出抗拒的空间。)而且这里面还有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生产伟哥的辉瑞药厂想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可是它在介入不同的地区的时候其实是会造成不同的效应的。比如,在台湾地区,它在做宣传的时候,它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论述等等,其实都不在辉瑞公司的预期之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具有横扫一切的力量;很多时候,它在移植到别处之后就行不通,或者即使是行得通,那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行得通。所以我们就需要注意资本主义在移植到别处时的文化和社会条件。

霍炬(陕西师范大学):

关于您二位的讨论,我心悦诚服,我只是想问,这样的讨论,是不是能够获得一种普遍性?我就问一句话:您认同不认同阶级斗争?

宁应斌:

简单来讲,认同(众笑),阶级是社会压迫关系的一种建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跟劳工阶级是他阶级分析的核心,那现在这两个

阶级有没有在没落中？这个问题也还是一直在辩论，但是阶级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与介入社会的范畴。

何春蕤：

我们认同阶级斗争，但是也认同性斗争、性别斗争、民主斗争等等。我认为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内是跟其他的剥削、压迫、歧视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性的压迫与歧视。这样的结合，才使得阶级压迫得以呈现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力。如果想要消灭阶级压迫，恐怕不只是针对它，你还得把周围的柱子都给拆掉，而且这些柱子也不是各个独立的，它们其实是纠缠在一个网络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被女性主义者批评，因为她们就认为这些柱子是分开来的，而性别是第一支柱，她们认为只要把性别这根柱子打垮，其它的也就垮了。而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管是在做“性工作”的研究也好、做“跨性别”的研究也好，我们背后其实都有对于“阶级”问题的关注。

张春田（香港科技大学）：

两位老师刚刚在描述你们的工作历程，我想，在你们开展工作的時候，一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成功之外，你们有没有过什么失败的经验，有没有什么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宁应斌：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们其实没有想到会造成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没有想到会被别人告上法庭（众笑）……我最后说一点话作为结语：我们今天虽然并没有主要去讲我们擅长的性别研究，可是通过和你们的问答，我感觉到，你们很多人性别问题还没有过关（众笑），基本认识不够，这样是不行的（众笑）！要做文化研究，你们就需要去了解那些被压迫者的真切的生存状况！

（录音整理：朱杰）